

·热点聚焦·健康中国·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 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医药文化的价值与路径

吴霞,马其南

(1. 辽宁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847)

摘要:近代以来,中国始终处于“古今中外之争”,中医药文化遭遇了“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境遇。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政党,以“第二个结合”传承创新中医药文化具有深厚的价值意蕴:有利于推进人民卫生健康事业,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有助于巩固文化主体性,破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的“古今中外之争”;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新飞跃,为治国理政提供历史启迪。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从以下路径传承发展中医药文化:批判继承中医药文化历史遗产;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以人民生命健康为中心,推动中医药文化大众化。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中医药文化;文化自信;文化主体性;健康中国

中图分类号: D25;R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094(2025)06-0044-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1]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样本。研究“第二个结合”理论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传承中医药文化的历史经验、实践探索和伟大成绩具有独特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在该领域,学界现有研究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传承中医药文化的举措的总结^{[2]74-75}^[3];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医药文化的深度契合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4],从“两个结合”角度阐发新时代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价值和使命^[5],梳理中国共产党传承中医药的经验与演进逻辑^[6]。关于“第二个结合”与中医药文化的关系,目前研究主要聚焦于“第二个结合”对中医药文化现代转型的理论阐释,缺乏从“第二个结合”的视域下研究中国共产党如何秉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历史主动,实现中医药文化振兴发展的伟大实践。

基于此,本文着重探讨中国共产党坚守人民立场,充分发挥文化主体性,深刻认识、完整把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事业发展重要论述研究”(22BKS198)。

作者简介: 吴霞,辽宁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科技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其南,辽宁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引文格式: 吴霞,马其南.“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医药文化的价值与路径[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7(06):44-55.

握中医药文化所蕴含的科学属性、人文属性和社会属性,在领导中医药事业发展历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医药文化相互成就、双向赋能的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

一、中医药文化内涵

中医药文化融合哲学思想、医学理论与医德伦理于一体,其内涵丰富深刻,主要体现在世界观、方法论与价值观三个层面,共同构筑了中医药文化的精神内核与实践指南。

(一) 世界观:“天人合一”自然观、“精神内守”社会观

“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强调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变化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中国古人们坚信人类是由天地之气凝聚而成的,宇宙自然构成了一个广袤无垠的“大天地”,而人则被视为一个微小的“小天地”或“小宇宙”。《灵枢·岁露论》认为“人与天地相参也”,即“天人相应”,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应当顺应自然规律,以实现天人和諧的理想状态。《黄帝内经》认为,天地阴阳之气在一日之内按照一定规律不断消长转化,“人亦应之”。“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理念,已深深融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石^{[7]101}。

“精神内守”的社会观强调人的健康与社会发展的统一性,人与社会环境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人在社会之中,其地位变动、财富增减、社会关系亲疏变化都会对情志造成影响,进而影响身体与心理的健康状态。因而,《素问·上古天真论》提出要“恬淡虚无”“精神内守”,认为凡防病养生,都须对外界事物无过多奢求,淡泊名利,去除极欲,安定情志。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摆正人与社会的关系,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

(二) 方法论:整体观、辩证思维

整体观强调人体与自然、社会的密切联系,把人体看作有机联系的整体,各个脏腑、组织和器官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是统一的生命系统。比如,“肝主疏泄”,中医认为肝脏与情绪调节、脾胃运化、气血运行等密切相关,肝郁可能导致脾胃功能失调,甚至引发情绪问题。整体观为中医诊疗提供了方法论,体现出中医对生命系统复杂性和动态性的深刻理解。

辩证思维是中医的底层逻辑和核心思维方式,贯穿于中医理论体系的方方面面。阴阳、五行、形神、天人相应都体现了辩证思维,即事物的对立统一、动态平衡和相互联系。阴阳学说揭示事物之间的对立与依存关系,五行学说阐释事物的生克制化规律,形神统一强调生理与心理的相互作用,天人相应则体现人与自然环境的整体关联。诊疗时以表里分病位、虚实辨正邪、寒热判病性,秉持“三因相宜”原则,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制定个性化的诊疗方案,都展现了辩证思维,彰显了中医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深刻理解。辩证思维体现了中医对自然、社会的规律性认识和对疾病复杂性、多变性的深刻把握。

(三) 价值观:大医精诚

“大医精诚”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中华民族伦理原则、道德情操和人文关怀在中医药领域的具体表现,体现了医者对医术精微、恻隐慈悲、言行诚谨的追求。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强调,大医治病要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8]12},并尽最大努力解除病人的痛苦,认为医者应不为名利所动,以救死扶伤为己任,体现了中医的慈悲之心,“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一心

赴救”^{[8]13},无论贫富贵贱、亲疏远近,都应一视同仁地施以援手,体现了中医的仁爱之心,彰显了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患者的关怀。同时,孙思邈还要求医者在诊疗过程中保持专注、谨慎,不应“瞻前顾后”,要不图名利,展现出中医不顾一己之身、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高尚医德,“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二、中国共产党传承中医药文化的价值意蕴

中医药文化作为文化复合体,蕴含着医药卫生价值、经济价值、科技价值、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等多重价值。挖掘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医药文化,对于巩固文化主体性,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先进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主线,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提出“第二个结合”,并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中医药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其融入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向赋能,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鲜活生动的实践样本,推动了中医药文化的繁荣振兴。

(一) 为推进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体制与健康事业、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重要保障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面对频发的自然灾害、社会动荡与疫病流行,中华民族的健康需求得以维系,人口得以延续增长,文明得以赓续传承,中医药学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充分彰显中医药疗效确切、预防保健独到、诊疗灵活且费用相对低廉的特色优势,强化医改惠民效果,丰富了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构建“中西医并重”的中国特色医疗体系。截至2024年,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年度诊疗人次近17亿人次,92%的二级及以上公立综合医院设有中医临床科室,超过4万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可提供中医药服务^[9],基本保障了中医药服务的有效供给和公平可及,为维护人民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推动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医学模式转型。由于中医药在治未病、防治重大疾病和康复中具有突出特色和优势,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已将中医药健康管理项目单列,2023年重点人群覆盖率超70%,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卫生发展模式从“重治疗”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全面健康管理”。

三是形成“低成本—广覆盖—高效益”的中国特色的卫生经济学范式。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发挥中医药“简、便、验、廉”的独特优势,乡村医生用“一根银针、一把草药”解决7亿农民基本医疗问题,以最低成本维护亿万群众的生命健康,成为中国开展初级卫生保健普惠式实践的核心经验。新时代,中医药在公共卫生服务中的潜力和优势正逐步释放。据统计,2023年,三级公立中医医院门诊次均费用比同级综合医院低约10.8%,住院次均费用比同级综合医院低约14.9%,实现“少花钱、多办事”。

作为全球影响力最大的传统医药体系,中医药目前已传播到世界196个国家和地区,为全球健康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据统计,15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约2.4亿人受益于以中国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累计挽救约150万人的生命,药品价格由每人份约10美元降至不足1美元^{[10]9}。通过标准国际化、产业合作等途径,中国还为全球各国传统医药发展提供中国经

验,搭建发展平台。例如,中国推动国际标准化组织设立中医药技术委员会,制定并发布119项中医药国际标准。为推进传统医药深度融入全球卫生体系,中国还推动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传统医学决议》《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战略》。此外,为了促进传统医药文化交流互鉴,造福各国人民,通过“一带一路”,中国建设高质量中医药海外中心30个、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31个。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发布多语种中医药诊疗方案,与150余国分享经验,“三药三方”被多国借鉴使用,体现了中医药力量。

(二) 为破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今中外之争”、巩固文化主体性提供活态样本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文化代际传承的基本纽带”^[11]是其内蕴的文化基因。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药是世界医药史上唯一未曾中断、持续发展的医学体系。自东汉以迄明季,以《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理论为基础传承发展,形成了独特的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宝贵遗产,中医药文化所蕴含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不仅反映着中华文明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更演化为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成为巩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载体。

近代以来,发轫于西方的现代化“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思潮侵入中国,文化价值抉择的“古今中外之争”^[12]一直困扰着中华民族,中医药文化的命运兴衰也成为近现代中国“古今中外之争”的活态样本。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日渐衰危,从文化自信沦为文化自卑,中医药面临着“文明蒙尘”的悲惨境遇。从道光皇帝下令太医院停止针灸科,到卫生管理制度的西医化、解体太医院,再到南京国民政府“废止中医案”的出台,西医与中医的交锋绝不只是科学体系之争,更是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较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评价成为现代性中国图景下亟待回答的文化之问。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为指导,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中医药发展规律和特点“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通过“第二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者间的文化张力纳入文化主体性的整体考量,既坚守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又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1],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体,为破解中医药文化面临的“古今中外之争”提供了方法论钥匙,为中医药文化的复兴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与“一带一路”合作深化,借助中医药文化向全球呈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拓宽中医药的全球推广,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注入动能,有助于促进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三) 为推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飞跃、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提供历史启迪

马克思主义与中医药文化虽然是来源不同的文化,但在价值观、方法论等维度高度契合,从而为“第二个结合”、为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奠定了必然性与可能性。中医药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大医精诚”“人命至重”“调和致中”等核心价值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契合,相互蕴含;中医药文化“仁、和、谦、廉、精、诚、慎、严”的医德要求为开展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了鲜活源泉。

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兼具科学属性、人文属性和社会属性。以“医”载“道”,以“医”弘

“道”，“道”以“医”显。中医药文化“上医医国”理念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黄帝内经》，体现了医学参与国家治理的悠久历史传统。中国共产党秉持高度的历史自觉，主动从中医药文化宝库中汲取智慧，创造性地将传统医学思想运用于现代治国理政实践。一方面，赋予中医药文化价值观、方法论新的时代内涵；另一方面，更重视从中医药文化中汲取智慧，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医药文化蕴含的唯物辩证法和实践观相结合，以深刻的“化学反应”将中医药文化的思想智慧转化为治国理政思想，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增添了更加浓厚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在医药卫生事业层面，以中医药“治未病”理念和措施赋能健康中国战略，让中医药成为人民群众愿意用、方便用、用得着的诊疗方式。在经济社会发展层面，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兼顾、标本兼治，提出“改革也要辨证施治，既要养血润燥、化瘀行血，又要固本培元、壮筋续骨，使各项改革发挥最大效能”^[13]。在党的建设层面，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严治党，提出“治治病，主要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区别情况、对症下药”^[14]。在生态文明建设层面，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运用中医整体观，强调要治好“长江病”，要通过祛风驱寒、舒筋活血和调理脏腑、通络经脉，力求药到病除^[15]，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三、“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传承中医药文化的实践路径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在领导中医药事业振兴发展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刻认识把握中医药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医药文化与人民群众的卫生健康需求的关系、中医药文化与精神文化需求的关系、中医药文化继承与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中医药事业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事业的壮丽画卷，始终与革命、建设及改革的洪流同频共振。

（一）正确评价中医药文化的价值，继承中医药文化历史遗产，打破近代以来中医药“西医在朝、中医在野”困境，为中医药文化振兴发展奠定基础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在“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西学东渐、门户开放，一切传统文化都被按照新的尺度加以评判。中医药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在医学革命和文化批判的双重冲击下，被斥以“落后、迷信、不科学”。民国之初，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使中西医之争从学理讨论上升到社会舆论，最终沦为旧中国政府从公共政策层面打压的对象。1912年，北洋政府通过“漏列中医案”，将中医排除在大学教育序列之外；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废止中医案”甚至主张废止中医，包括禁止旧医(中医)学校、取缔宣传旧医的新闻杂志等，中医药生存发展边缘化。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化自觉和历史主动，在“第二个结合”的历史进程中，对“中医非科学”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展开有力批判，对中医的科学性及其价值进行再判断，回应了中医药文化“古今中西”的文化论争，为重构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提供了有益镜鉴。

1. 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第二个结合”的重大论断，为传承创新中医药文化提供方法论指导。鸦片战争后，近代中西医之争折射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认识和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面对如何评价中华文化价值的问题，毛泽东强调：“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

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16]623},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16]708}。基于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新时代,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战略高度,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7],即“第二个结合”,并从巩固文化主体性的视角阐释了“第二个结合”深远意义,也为正确评价中医药文化价值、传承中医药文化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指导。

2. 客观审视中医药文化价值,强调“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提出“宝库论”“瑰宝论”“钥匙论”。毛泽东认为,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毛泽东强调“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18]245}。毛泽东对中医药工作作出指示:“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18]258}1954年,《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艰巨任务,只有通过中、西医的长期合作,才能逐步完成。”^[19]1958年,毛泽东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18]462}毛泽东以大历史观深刻地洞察了中医药文化作为祖国历史文化遗产强大的生命力和优势所在,将中医学比喻为“伟大宝库”。在“宝库论”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瑰宝论”。1996年,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强调:“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20]2010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出访澳大利亚时首次从文明的高度指出:“中医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21]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的贺信中再次强调:“中医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22]这一论断揭示了中医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更阐明了其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价值。

3. 分析中医药形成发展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指出“医道中西,各有所长”,充分肯定中医药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强势输入的冲击下,传统的中医药基础理论与技艺的科学性遭受质疑否定。从现代文明进路展开文化反思,除了经济、社会、政治层面的因素,还要“洞悉文化生成的机制性优长与缺失”^{[23]728}。相较于西方现代医学以观察和实验为依据、重视实验方法的运用,中医理论基础则以“阴阳五行”学说、“天人合一”学说等中国古代哲学为基础,擅长以经验理性和辩证方法阐释分析生理现象、病理变化,轻视工具与理论的提炼。中医学作为中国古代医学科学的典范,具有自身特有的学科范式和学科架构。对于近代中西医之争,青年毛泽东在读书笔记《讲堂录》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24]597}毛泽东从“民族历史”到“世界历史”的文化视野对中西医展开辩证思考。

近代以来,中西医之争背景下关于中医科学性、有效性的争论一直持续,未曾中断。1955年,新中国卫生界出现了一场关于中医科学性的争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以“中医非科学论”为代表的民族文化虚无思潮展开批判。第一,面对“阴阳五行为什么不能拿现代术语表达?”的问题,毛泽东从中西医产生发展的社会物质条件出发,强调“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25]205}。作为农业文明的产物,中医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天人合一的关系,以整体、辩证、发展为特点,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经验直观、主观性等历史局

限,从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层面深刻揭示了中西医的术语“不可通约”的根源所在。第二,指出中医没法用现代术语解释清楚的,是因为“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但绝不能因为还不能做出科学解释就“轻易加以否定”。人的认识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一代人搞不清两代人行不行?十代人行不行?”^{[26]492}。第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认为阴阳五行学说与现代西方医学一样具有科学性,承认中医药学的科学价值。毛泽东认为,中医药学经得起几千年的实践考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繁衍昌盛,中医药作用功不可没,肯定中医药学的历史功绩,充分肯定了中医药的科学性,反对以西方医学作为唯一标尺来评判中医的科学性。毛泽东强调要注重考察的实际疗效,“中医尽管有些道理说得不明白,欠妥当,但行之有效,这就是真理”^{[27]577}。20世纪50年代,在党中央的推动下,围绕医疗体系、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新中国的中医药事业开始启动,为中医药的蓬勃发展夯实了基础。

4. 中医药文化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行力量。中医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载体,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双重价值。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秉持全球化视野与战略思维,推动植根于中华文明的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惠泽全人类。毛泽东在谈及中医指出,“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高度^{[18]245}。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瑰宝论”和“钥匙论”,强调要“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推进产学研一体化,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让中医药走向世界”^[28]。这些重要论述肯定了中医药学的科学价值,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案与智慧。随着世界医学的发展,中医药日益得到国际组织和世界多国的认可,中医针灸、藏医药浴等中医药文化瑰宝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源自中医药典籍的青蒿治疟方,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开展抗疟的首选药物,使全球各年龄组危险人群疟疾死亡率下降了60%^[29]。

中医药文化还是助推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文化软实力的“中华文化伟大复兴先行者”^{[30]101}。中医药文化之所以能担此重任,其原因在于中医药文化的理论架构与儒、释、道思想同根同源、交相辉映,完整继承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堪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医药文化从基本理念到实践方法、从思维模式到表达方式,系统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中医药文化完整保留了中国传统哲学智慧、诊疗体系和养生理念,成为中国古代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活态传承,成为最能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文化标识,成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载体。2019年,《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中指出,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促进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进一步强调,要推动中医对外话语建设,讲好中医药故事,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二) 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推进产学研一体化,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1954年,毛泽东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医要进大医院,中医要进医科大学,中医还要出国。中药要发展,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18]259}。中国共产党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以教育人才为关键、以中医药产业化为推动力,通过推进中医药产学研一体化,建设代表性的高水平中药科技创新和转化平台,系统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为

提升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创新驱动力。

1. 建设中医药研究的科学建制,夯实中医药现代化的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中医科学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31]81}。1955年,新中国中医药研究最高机构——中医研究院成立,下设中药研究所。1969年,党中央开展代号为“523”的抗疟研究项目集体攻关,屠呦呦作为项目负责人从古代中医药典籍《肘后备急方》所述的青蒿“绞汁”获得启发,改用低温方法有效分离提取抗疟神药青蒿素,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79年5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成立。2005年,科技部在“973”计划中面向中医理论基础研究设立专项,开展中医理论体系文献整理、科学阐释与创新发展研究。

2. 加强顶层设计,不断建立完善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的国家政策体系。进入21世纪,党中央提出要加强重大疾病防治、中药生产关键技术、中医复方以及基础理论的研究。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积极发展中药产业,推进中药生产现代化”的发展目标。1999年,国家科委等部委正式确立“中药现代化”战略目标。2002年,新中国第一部中药现代化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发布,构建现代化中药创新体系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强调要发展中医药,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让中医药走向世界。

3.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构建比较完善的中医药科技创新政策体系。中医药发展离不开创新,当代科技创新为实现中医药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内在驱动力。《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提出,要统筹利用相关科技计划,支持中医药科技创新工作。近年来,党和国家大力发展数智技术,助推中医药科技创新,提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逐步融入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全链条各环节,全力打造数智中医药,为中医药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中医科学院等科研机构、上海中医药大学等高等院校以及华为、百度等企业,以产学研协同积极开展中医药大模型研发。2023年以来,“数智岐黄”“华佗中医药大模型”等多个中医药AI大模型相继发布,涵盖药物研发、临床诊疗、医学文献分析等多个领域。

4. 建设现代中医药产业集群,构建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格局。中医药是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利用现代科技发展中医药,推动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医药发展的重要政策。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八路军利华制药厂用中药柴胡研制出中药针剂史上第一支肌注中药注射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推动公私合营,支持中药老字号企业创新发展。1957年,中药老字号同仁堂下属的中药提炼厂成立,开启中药西制,推出了片剂等新剂型。70多年来,新中国中药产业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传统的前店后场模式到“龙头企业+加工车间+专业合作社+种植户”模式,中医药产业链日益成熟,现代中医药产业集群建设加速,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以同仁堂、云南白药等为代表的中药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医药科技产业园蓬勃发展。通过数字化赋能中成药制造药理机制和核心工艺,中药生产方式从“手工—机械—智能”现代化转型,从丸、散、膏、丹为代表的传统中药剂型发展为滴丸、智能颗粒、超微饮片等几十种剂型。

(三) 坚持以维护人民生命健康为中心,充分发挥中医药在人民卫生健康事业中的特色和优势,从医疗、防控、预防三个维度,建设中医药健康服务体系,推动中医药文化大众化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人民群众是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的根基所

在。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高度重视人民卫生健康事业,将中医药纳入国家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以中医药服务人民健康,注重提升人民群众对中医药文化的了解和认同,推动中医药健康服务和中医药文化大众化。

1. 确立“中西医结合”的基本原则。自明末清初西医传入中国,中医药学始终面临一个关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核心命题:在现代化语境下,如何建构中医药的学理合法性基础与发展路径?如何保持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与特色优势,如何实现中医药学的现代转型?

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特别是医疗卫生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倡导中西医合作,确立了“中西医结合”基本原则,提出了“坚持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政策。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在革命摇篮井冈山遭受敌军的严峻封锁,缺医少药,面对“医生药品均缺”的情况,伤兵采用“中西两法治疗”^{[32]65},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一贯提倡团结中西医和中西医结合方针政策的发源地”^[3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强调中西医结合的重要性,号召中西医团结合作,共同为军民服务。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强调中西医要讲统一战线,指出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这两种医生要合作”^{[25]154}。1944年,陕甘宁边区政府确立了中西医合作方针。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运动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新中国卫生工作方针。1954年,毛泽东多次批示纠正轻视中医的错误,提出“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1982年,“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首次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中医药法律地位。1997年,“中西医并重”被列为卫生工作方针之一。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坚持“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中医药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34],“坚持中西医并重和优势互补”^[35]。

2. 发挥中医药在疾病治疗中的特色优势。中央苏区时期,中华苏维埃政府提出“一切为了伤病员”“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方针。中央苏区党政军民就地取材,组织采药队在当地郎中的带领下上山采集中草药,解决药品紧缺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卫生形势严峻,尤其是乡村地区缺医少药,约八成病患得不到有效医疗^{[36]350}。针对这一问题,毛泽东指出,搞好中医工作,才能担负起几亿人口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18]69}。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石。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医医疗服务体系持续完善、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已建立起了覆盖城乡的,融预防保健、疾病治疗和康复于一体的中医药服务网络。2023年,中医类总诊疗量达15.4亿人次,占全国诊疗人次的六分之一。

3. 发挥中医药在疫病防控中的预防和治疗作用。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繁衍生息的历史,也是与疾病抗争的历史。在疫情防治方面,中医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早在商代的《卜辞》中,就有关于疫病的描述。据历史记载,自西汉至清朝末期,中国先后发生了300多次流行疫病。在中医药的防控治疗下,疫情得以有效控制,病患得到对症救治,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欧洲黑死病、鼠疫等致死数千万人的瘟疫灾难。中国共产党继承古代中医药防疫精华,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紧紧依靠中医药力量开展疫情防控。实践证明,陕甘宁边区先后出现过鼠疫、伤寒、霍乱等传染性疫情,中医药方在抗击传染病疫情上效果显著^[37]。新中国成立后,历经流行性乙型脑炎、非典、禽流感、新冠肺炎疫情等数次重大疫情考验,中医在预防、治疗和预后等

环节的功能日益彰显。

4. 发挥中医药“治未病”优势。中医学在总结劳动人民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中,首重预防。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就提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治未病”思想作为中医学的重要理念之一,不仅与现代公共卫生中“预防为主”高度契合,更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慢病防控和传染病防治提供了宝贵借鉴。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面对“无药可用、有病难医”的困境,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卫生防疫不仅是“治病”,更是“防病”。例如,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刊发中医药预防疾病的科普文章,宣传中医药知识,提升群众的健康意识和中医药认知^[38]。2007年,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开创性地将中医“治未病”作为工作要求,“治未病”健康工程在全国启动实施。新时代,“健康中国2030”提出了“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指出,“中华文化历来强调健康养生、祛病健身”^[39]¹¹²,要进一步发挥中医药治未病重要作用。

5. 创新中医药文化传播形式,推进中医药文化大众化。中医药文化蕴含着深厚的哲学智慧和人文精神,在人民群众中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文化认同,对提升公众的中医药文化素养,提升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作用。新时代,党和国家发挥多元协同机制,以多种形式传播中医药文化,推动中医药文化大众化。一是完善政策体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中医药文化建设作为中医药工作的主要战略内容,从宏观上对中医药文化建设工作开展指导。二是创新中医药文化的传播方式与承载媒介。近年来,以民族医药博物馆、中医药院校校史馆、中医名家故居和“中华老字号中医药博物馆”等为载体,深度挖掘中医药文化旅游资源,系统策划中医药报刊、书籍和音像制品的出版发行,合力驱动中医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官方主流传媒策划播出《中国中医药大会》《少年中医说》等电视精品节目,以科技赋能、时尚化诠释、生活化融入等多维路径,对中医药文化进行现代性转化,宣传中医药文化的悠久历史、传统技艺、医德信仰等内容,提升人民群众中医药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此外,中医药文化夜市也成为市民健康保健新载体,中医夜校和夜间推拿门诊更是在青年群体中“圈粉”无数,传统中医药正以各种文化载体和产业形态融入健康中国,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医药文化的伟大实践,不仅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活态样本,更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能带领中医药文化走向振兴发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第二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医药文化双向赋能,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既要守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尊重中医药自身的发展规律,传承其历经千年检验的理论体系、诊疗智慧与人文精神,确保其本色不褪、精髓不失;又要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运用其科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破解中医药发展面临的时代课题,推动其与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健康理念相融合,开辟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新境界。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才能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 人民日报, 2023-06-03(01).

- [2] 王芳,彭召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医药传承创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 [3] 欧阳雪梅.中国共产党与中医药的百年传承创新[J].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20(02):38-50.
- [4] 钱宇晨,杨一丹.“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医药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伦理意蕴和价值效用方面的契合性研究[J].中国医学伦理学,2024,37(10):1222-1228.
- [5] 方旭,徐文.从“两个结合”看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的历史性贡献[J].重庆社会科学,2024(09):90-103.
- [6] 丁元辰,殷忠勇.“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价值和使命[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5(02):71-76.
- [7] 杨殿兴,刘力.中华文明与中医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2.
- [8]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校释[M].李景荣,等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
- [9] 雷海潮.推动中医药服务人民造福全球[N].学习时报,2025-07-07(01).
- [10]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orld Malaria Report 2015[R]. Geneva: WHO Press,2015.
- [11] 赵传海.论文化基因及其社会功能[J].河南社会科学,2008,16(02):50-52.
- [12] 崔发展,黄荣琴.古今中西之争: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二维架构[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6(03):34-40.
- [13] 习近平论全面深化改革[EB/OL].(2025-10-20)[2025-10-28].https://www.xuexi.cn/lgpage/detail/index.html?id=404809067460494703&item_id=404809067460494703.
- [14]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2013-06-19)[2025-10-28].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176/201307/t20130730_154752.html.
- [15] 习近平.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6-14(02).
- [1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7]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01).
- [18] 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19] 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N].人民日报,1954-10-20(01).
- [20] 江泽民.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6-12-10(01).
- [21] 陈小方.习近平出席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N].光明日报,2010-06-21(08).
- [22] 习近平.习近平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的贺信[N].人民日报,2015-12-23(01).
- [23] 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
- [25]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缅怀毛泽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27] 马伯英.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
- [28] 习近平.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N].人民日报,2018-10-26(01).
- [29] 王昊男.屠呦呦:青蒿济世 科研报国[N].人民日报,2021-06-01(06).
- [30] 张宗明.中医文化概论:第2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3.
- [31]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3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3] 汤江峰.毛泽东主张团结中西医 倡导中西医结合[N].大众卫生报,2021-04-29(04).
- [3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

28(01).

- [35] 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9-23(02).
- [36] 张伯礼.百年中医史:上[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 [37] 王刚,李芳菲.毛泽东、邓小平领导抗疫的历史经验[J].中国领导科学,2020(02):19-22.
- [38] 张金福,庞思娇.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对中医药的宣传报道探析[J].上海党史与党建,2024(04):70-75.
- [39]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

责任编辑:杨春风

编辑部网址:<http://sk.swpuxb.com>

The Value Implic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of the CPC in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WU Xia, MA Qinan

(School of Marxism,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enyang Liaoning, 110847, China)

Abstract: In modern times, China has been involved in controversies over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and over "the Chinese and the Western", leav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n a marginalized unofficial position while the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official position.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TCM has been inherited and innova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hrough the "Second Combination." This approach advances public health and contributes to a global health community, strengthens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resolves debates abou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romotes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m and provides insight for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CPC has critically inherited the legacy of TCM culture, promote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with people's life and health as the priority.

Keywords: "Second Combina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cultural confidence; cultural subjectivity; healthy China initiative